

四川永川地区推行各种形式农商联营

为商品生产提供多方面服务

生产者走向流通领域 经营者进入生产领域

本报讯 四川省永川地区在改革农村商业体制中广泛推行多种形式的“农商联营”，使供销社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发展商品生产服务的轨道上来。

永川地区的农商联营从1980年7月开始在合川等县试点，当时仅限于农副产品购销联营。1982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满足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永川地区农商联营由流通领域向生产、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的纵深发展。各地供销社除继续开展农副产品联营外，还办起了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等三种新的联营形式。

联营时间因“物”制宜，有的是季节性的，有的是长期的。

农商联营双方的责任是，供销社负责向生产者提供信息、资金、技术和物资等方面的服务，并负责推销、代销产品；生产者根据合同按一定比例分别用购销或派购、议购相结合的形式把产品交给供销社，同时享受产品销售后返还红利的待遇。

实行农商联营，使供销社与农民结成利益与共的经济联盟，起到了组织农村商品生产经济中心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永川地区各级供销社在1982年1月到11月，就为联营的农民提供资金300多万元，派出技术人员1,300多名，帮助农民发展商品生产。到1982年11月底，全地区参加联营的生产队、农场、果园、茶园等生产单位已有17,680多个，专业户11,000多个，联营总值3,100多万元，约相当于全年农副产品收购计划的65%。

农商联营的实践，引起了一些有关部门和当地经济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他们认为，农商联营使生产者走向流通领域，经营者进入生产领域，对促进农村商品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为改革农村商业体制积累了有益经验。

四川永川地区从1980年开始在合川县实行农商联营，三年来无往不利，现已扩展到全县8个县的17,680多个生产队、农场、果园以及10,000多个专业户；并由购销发展到生产、加工等新的联营形式。这项新开拓的事业，在促进商品生产、搞活农村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

农民的追求

永川地区供销社的同志自豪地说，农商联营经受了实践的检验。检验的结果：1982年，全县各级供销社同农民联营的农副产品总值3,100多万元，约相当于全年收购计划的65%；品种达37种。到1982年11月底，全县农副产品收购实绩已有4,500万元，占全年计划的95%。

其实，供销社同志的介绍只说到一半。农商联营还经受了一种更严格的检验，就是农民在实行“双包”责任制后，用发展商品生产的要求，对一切农村工作，包括各种经济组织的形式、体制以至有关业务部门的作风、活动方式进行的最严格、最权威的选择和取舍。

农商联营就是在这样一种严格检验中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在永川地区，不断发生农民找供销社的。1982年12月下旬，记者在嘉陵江、渠江、洛江汇流的合川县供销社采访时，就见到了这种情形。一位从高龙公社赶来的陈杰文的农民，缠着县供销社副主任罗爱群，要求扩大同供销社的联营。1982年初，陈杰文同供销社签订了养鸭联营的合同，养了90多只良种鸭。现在，他希图扩大联营规模，再增加500只小鸭，办一个家庭养鸭场。

罗爱群告诉我，农民希望联营的要求很强烈，就拿养鸡来说，纳入联营的已有46,000多只，但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近3个月来，直接找到县社要求联营养鸡的就有100多人。现在就是鸡源有困难。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县供销社除了提供鸡苗和种鸡外，还培养了79名养鸡技术员，为联营的农民免费服务。

农民不仅追求联营，而且丰富着联营的内容。永川县双石公社社员孙自凤，1982年秋天找到当地供销社时，养鳊鱼行不行？她想的是为外贸提供出口货源。供销社从她身上看到了农民希望发展商品生产的可贵热情，当即担保：由供销社提供150元资金，帮助她修建一个15平方米的养鳊池；投产第一年的利润一成归供销社，九成归孙自凤。以后由孙自凤自己经营，供销社负责推广产品；池池贷款用产品归还。

象这样通过联营发展起来的新产品品种，自近两年永川地区引进了十多种新产品从没有过的新品种。

一种新的联营开拓了一种新的生产门路，不仅有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给人以启迪：农商联营，给农民开辟了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生产逐步富裕起来的光明大道。

心联在一起了

农民欢迎和追求农商联营，原因很简单，因为通过联营使供销社同他们的关系变了。

永川地区供销社有几个统计数字：1982年，各级供销社根据联营协议，派出专职技术干部992人，雇请技术人员380多人指导农民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扶持资金、预购定金共320万元；根据协议返还利润127万元；供应化肥、农药21,000多吨。当然，对于拥有750万人口的水川地区农民来说，这样的物力和财力不算大。农民是从供销社满腔热情帮助他们发展商品生产在留银案的凤岭山。就这样，凤岭山便成了供销社同农民联营黄花的基地。供销社提供了资金23万元，还专从外地聘了一名技术员到现场指导。产品80%交售国家。两年时间，凤岭公社的黄花从零发展到1,300多亩。今年，供销社把试种的农产品拿到全县黄会上鉴定，以其枝长、肉厚、花多的特点名列前茅。待全部投产后，生产的农民每年可得200多万元的收入。供销社把四百年前的“财神”请回来了，一批这件事谁都知道。

农村商业要回答农民的挑战

本报评论员

在推行“双包”等多种责任制的基础上，我国农村经济正在从自给、半自给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生产转化。亿万农民群众努力发展商品生产的局面，给农村商业工作提出了一个课题：是实行改革，开创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局面来适应新形势，还是维持现状，让“形势”来适应自己？是不断地改变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率为农民服务，还是让亿万农民适应一些商业单位管理的方便？这是各地商业部门、每一个商业工作者都必须作出回答的重要问题。

当前，农民在土地承包以外的生产和经营逐渐扩大。在专业生产组、园、场不断出现的同时，各种重点户、专业户也越来越多。这些专业化的生产单位，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水平的提高，开始从不同角度提出协作或联合的要求，有的已经按照有利于生产和自愿互利的原则，初步建立

国务院港口领导小组要求各方协作

努力完成今年港口外贸运输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电，国务院港口口岸工作领导小组、国家经委顾问

郭洪涛说，1982年外贸货物海运量达8,400万吨，比上年增长10%以上。今年的外贸货物海运量又将比去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估计平均每天

如果说是前年服务使人喜出望外，而生产后的服务却常常令人怨声载道。1982年秋后，大足县就发生一起“联营受苦灾”的故事。大足县中教1982年甘薯大丰收，两分钱一斤也难赚。幸好这个区搞了联营，供销社根据市场需要，发动农民加工工业用淀粉和食用粉条，并在成都、重庆找到了销路。全区收购淀粉60万斤，农民除得到收购价款外，供销社还按联营规定，每斤淀粉返还红利2分。农商双方皆大欢喜。

象这样为农民疏通渠道、排忧解难的事，不胜枚举。璧山县的花生、江津县的板鸭……，都是通过联营这条路，发展了生产、打开了市场。经济上的联营使农商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还深刻地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合川县供销社果品公司副经理丁大禹，是五十年代学果树专业的中专生，性格开朗、泼辣、健谈。丁大禹在帮助农民发展柑桔生产上还是个实干家。合川县年产量在3,000万斤以上，近两年全县几乎所有的果园都参加了购销联营，果品公司业务由单纯收购扩大到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服务。1982年，丁大禹从春末柑桔开花一直到秋天生产过程中，在沙溪公社柑桔林里整整忙了二百多天。记者在沙溪公社采访时，农民们齐声称赞“丁老师”，从没有听人叫过他“副经理”的街衔。就在丁大禹蹲点的公社，一位老农说：“联营便是把心联在一起了。”确实，还有什么话能准确地解释这场深刻的变革呢？

富民政策和爱国之心

永川地区的农民由卖地拥护三中全以来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政策，他们把农商联营看成是其中一部分，理由是实行农商联营能够加快致富的速度。前面所举的好些事例侧面说明农民得到的实惠，但真正使农民振奋的，还是农民在得到实惠的同时表现出来的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江津县茶家公社马家四队社员曾繁生，一家6口包了8亩地。他拿出1亩6分地同供销社联营，种植辣椒。供销社为他提供秧苗，并派技术员具体指导，还预拨了200多斤化肥。结果，收获干辣椒1,500斤。夏天辣椒下种，从重庆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提出以每斤1.4元的高价买辣椒。曾繁生立即回答：“这是供销社联营了”。他高价买辣椒，曾繁生立即回答：“这是供销社联营了”。他高价买辣椒，曾繁生立即回答：“这是供销社联营了”。

古代有“投桃报李”的佳话，曾繁生在处理国家同个人的关系上却反映出社会主义农民的高贵品质。国家有富民政策，农民有爱国之心。当农商联营这种经济形式把农民同国家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行政命令和空洞的政治口号掩盖了多年而无法实现的事情，竟能顺当地出现在眼前了。

农民在联营后焕发出的爱国之心，甚至使“老供销社”也始料未及。1982年，上级给大足县中教区供销社下达了收购110万元农副产品的任务。供销社主任当时忧心忡忡，担心农民要卖高价，任务完不成。后来推行农商联营，搞了21个品种。他又担心这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结果大出意料，农民把产品源源不断送来，就连市场畅销的枳壳（中药材），农民也把13,000多斤全部卖给了供销社。到1982年11月底，共收购农副产品120万元。

农商联营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不无疑虑地认为，供销社经营农副产品本来就没有一点盈利，要返还一些给农民，又要拿出钱扶持生产，这样费勤费力搞个啥？现在，农联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回答的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指上，它使人看到美好的远景……



北京花灯喜迎春

临近春节，北京鼓楼上挂起了“春节花灯会”的横幅，吸引了不少过节的行人。“老北京”乐呵呵地说：“多年不见的花灯会，如今又办起来了，是个值得庆祝的事啊！”

农历正月十五晚上，是我国传统的灯节。旧时代代起在民间就有灯会的习俗。北京的灯市明代时从农历正月初八开始，到十七日结束。其中初八到十三最热闹。灯市先在东城的灯市口，后来迁至前门外的廊房，一度在天安门前的灯市街有过灯市。这样一深入受人们喜爱的民间集市，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就日渐冷落了。但是灯市口的名字却并没有虚名地保留下来。

今年的“春节花灯会”，是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和东城区文化馆联合举办的。自去年9月筹办以来，已从民间和一些工厂征集到500多盏花灯。它们被陈列在鼓楼的两个大厅里，供人观赏。

花灯会的大门旁，蹲着两个一人多高披毛挂彩的狮子，眼睛和脊梁都能放光，这是北京市制灯厂

等多方面，为农民提供生产前、生产后的服务，并通过这些服务，促使商品生产向专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联合。这种联营不是在行政干预下实现的，而是在农商双方互利的基础上实现的。他们的做法可以借鉴，他们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精神更值得学习。

供销社要为发展商品生产服务，必须改革体制，改变作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要把供销社由国营变成农民集体经营，尽快恢复他们早期原有的合作商业性质。这是利国利民的好政策。一些在改革中取得成效的地方提供的经验说明，把供销社变成农民集体经营后，经营者关心生产，生产者关心流通，生产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计划同农民利益也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利于城乡交流，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发挥供销社作为农村商品流通渠道的作用。

亿万农民已经发出挑战，希望广大农村商业工作者，勇于实践，勇于改革，勇于创新，拿出无愧于伟大事业的答卷！

仙游度尾公社鼓励社员自建仓库

本报讯 记者张铭报道：一间不大的土墙瓦房里，飘出阵阵柑桔的芳香。推门进屋，只见一箱箱黄澄澄的柑桔放得整整齐齐。这是福建省仙游县度尾公社度尾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保鲜库，这里存放着他们负责保管的一万斤柑桔。这个公社由于有了二十几个家庭水果保鲜承包户，今年春节可供应市场25万斤新鲜柑桔。

过去，柑桔保鲜是果品部门的一大难题。由于采摘、运输与保鲜之间脱节，果品部门收购的桔子到春节上市前往往烂掉一半，损失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

现在，水果产区实行了承包责任制，鼓励社员自建家庭仓库。按照合同规定：果品部门每百斤付保管费2元，保鲜率达70%以上者，100斤柑桔只需上交70斤，剩剩自己，不足照赔。这就调动了承包户的的积极性。他们从采摘起就为保鲜创造条件；轻摘轻放，认真挑选，仔细涂药。入库后定期翻动，控制湿度、湿度，及时清除陈腐。苦竹大队农民陈瑞去年保管380担柑桔，保鲜率达92%。

目前，这个公社的水果保鲜率已普遍达到80%以上。

长航积极作好春节客运工作

长江航运管理局积极作好今年春节旅客运输工作，让广大旅客走得了，走得好，走得安全。

长江航运管理局投入今年春节运输的客轮有133艘，共计115,000个客位，并增开了上海至南通、上海至高港、汉口至团风、宜昌至巴东

等航线的班次。

长航沿江各港都增设了售票点、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坚持做好团体预订票和送票上门。南京、九江等港还腾出一些场所作旅客候车室。各分局、港口、客轮在春运期间都实行昼夜值班，以便随时帮助旅客解决困难。



中国羽绒制品裘皮和革皮服装交易会

成交额创最好成绩

在上海闭幕的中国羽绒制品裘皮和革皮服装交易会，成交额超过计划30%，创造了历届交易会的好成绩。在近1,000种商品中，有以鸭绒、鸭绒为填充料的男、女服装，各种羽绒制品、裘皮制品，以及牛皮、羊皮面革的各式大衣、茄克衫等。成交额最多的是以米黄色为主，以红、黄、黑三种颜色面料配色做成的各种羽绒服。

来自日本、西德、英国、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士、香港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客商，同我国27个省、自治区的进出口公司洽谈了交易。

中同轴电缆工程京郑段工程质量好

我国去年年底建成的京汉广中同轴电缆1,800路载波工程北京至郑州段，邮电部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工程质量良好。

这段工程全长843公里，具有四个系统，有7,200对人用电话，互不干扰。将大大缓和北京、河北、河南地区之间长途通信的紧张状况。



工商调拨

增强干部群众对控制人口的紧迫感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四川省层层算人口土地粮食账

1971年至1981年，四川省逐步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全省累计少生1,254万人，平均每年少生114万人。一个婴儿成长到16岁，抚养费按2,500元计算，16年内国家和家庭可少付313亿元，平均每年19.5亿元，相当于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目前人均消费计算，仅粮食每年可少消费60亿斤

本报讯 通讯员谭书顺、侯文芳报道：在全国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中，四川省各级党政领导注重从实际出发，层层进行算账教育，已初步收到提高自觉性、落实节育措施的成效。在宣传月活动部署会上及电视、广播讲话中，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联系四川省实际，带头算了几笔人口、土地、粮食账。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口增长太快，加上建设用地，全省人均耕地面积由五十年代的1.8亩减少到现在的0.9亩。在这期间，四川省国民经济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人均收入、人均粮食占有量以及人均消费额仍然很低。以粮食生产为例，全省粮食总产量虽由298亿斤增加到700多亿斤，但人口增长了74%，人均粮食占有量只增加了100多斤。1981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达到近465亿元，在全国占第5位，而人均工农业产值却只有473元，在全国占第25位。人口大量增长，给人民在穿衣、住房、交通、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是很大的。

二是从1971年到1981年，四川省逐步加强了计划生育工作，这十一年间，全省累计少生1,254万人，平均每年少生114万人。就抚养费来说，从一个婴儿成长到十六岁，按目前城乡平均2,500元计算，少生1,254万人，国家和家庭在十六年内就可少付抚养费313亿元，平均每年为19.5亿元，相当于现在每年全省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目前人均消费来算，仅粮食一项，每年要少消费60多亿斤。在现有水平上，每年要增产这么多粮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是抓了计划生育，让这1,254万人生下来，那么，四川省现在的人口就达到了1.1亿多，1981年全省人均粮食占有量就要由702斤降到620斤，人均国民收入就要由284元减少到252元。

三是现在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人口，全省有6,200多万。这批人将在本世纪内结婚生育，平均每年就有300多万人、150多万对。如果按照有些人所希望的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计算，到本世纪末全省人口将达到1.3亿多。要是出现这种局面，人均耕地面积就会由现在的9分9厘下降到7分多。在这有限的土地上生产粮食来满足新增人口的基本口粮需要，还要提高人民现有的生活水平，无疑是很困难的。

通过层层算账，广大干部、群众提高了搞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和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全省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婆劝儿媳，妯娌共勉，夫妻首先落实节育措施和积极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动人景象。

新华社南京2月3日电 台盟总部主席蔡啸2日在

台盟南京支部举行的迎春茶会上发表了给台湾同胞的春节贺信。蔡啸在信中间台湾同胞热烈热烈祝贺。他说：每当春节来临，亲人们总要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全家团聚。这是我们纯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传统。他指出，中国是文明古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但是台湾的青少年却

蔡啸发表给台湾同胞的春节贺信

从未来能一览敦煌之博、长城之伟、三峡之壮、桂林之美。离开了最广阔的沃土，失去了祖先的根基，割断了我们祖先的历史，就不能吸取灿烂的华夏文化的精华，培养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继承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他接着指出，统一祖国，正是为了我们子孙万代，为了整个国家和中华民族。

公安部消防局呼吁加强春季防火工作

本报讯 公安部消防局呼吁各地，认真加强春季防火工作。据统计，去年全国发生的火灾次数、在火灾中伤亡的人数和经济损失均比1981年下降16%至18%。但是，去年由于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仍达18,700多万元，有5,000多名无辜者伤亡。

目前，春节将至，也是往年发生火灾较多的季节，公安部消防局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不要麻痹大意，采取措施，切实做好今春的防火工作。



本报记者 林里

罗湖车站附近，有个渔民新村，几乎成了来访者的游览胜地。其实，渔民新村已不再是渔民新村，再这么叫就不对了。

渔民靠捕鱼为生，是要出海打鱼的。可是，眼前渔民新村的渔船，变成了海上运输队；渔民呢？变成了饲养捕鱼的管理员和驾驶汽车、轮船的驾驶员。……渔村，正在向着城市化、工厂化的道路迈进。

1981年，渔民新村的总收入是62万元。其中由车队和船队组成的运输队，收入多达45万元，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三稍多一点；渔民新村的190亩鱼塘，收入2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6万多元，才占总收入的十分之一稍多一点。1982年总收入增至78万元，比例大体与上年相同。就是说，从经济构成上看，渔民新村也失掉了它的本意。

渔民新村有35户人家，1981年集体分配35.4万元，1982年为38.5万元。连续两年平均每户收入都在万元以上。各家副业收入，在工商企业工作的职工收入，都没有统计在内。渔民新村的人均收入，1981年是2,531元，1982年是2,750元。中央领导同志赞扬说，他们在人均和人均方面的收入都是全国第一。

形象，往往比数字更容易拨动人的内心的激情。加上广东同志说话爱用感叹语，所

北京前门、西单大街的部分商业和服务业试行经营管理责任制伊始，外埠人员来京参观学习之风骤起。1月13日，天桥百

货商场等七个企业与崇文区有关业务部门正式签订承包合同，三天以后，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山西、河北、广西、山东、湖北等省（区）、市的一些单位，有的由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有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带队，有的是县有关领导带队，少则三五人，多到十几人相继前来参观学习。

连日来，天桥百货商场每天接待参观者少则三四批，多则五六批。于是，商场经理

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得不到重用？

首都部分归侨就工程师江永絮受排斥打击一事举行座谈

本报讯 记者王源元报道：2月3日上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邀请首都部分归侨知识分子40多人举行座谈，就本报1月31日发表的归侨、工程师江永絮受排斥打击一事，展开畅所欲言的讨论。

国家体委为开好五届全运会决定采取四项措施 三月份开展体育道德律宣传月活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国家体委作出决定，将在今年3月在运动队伍中开展体育道德律宣传月活动。为了开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扭转赛场不良风气，国家体委决定采取以下四项措施：一、将在今年3月在运动队伍中开展道德律宣传教育月

活动；二、对违反体育道德的中国足球队和哈尔滨市冰球队有关人员给予纪律处分，通报全国；三、颁发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实施细则；四、在第五届全国预赛和决赛中开展“精神文明奖”评选活动。

吴学谦同舒尔茨会谈结束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学谦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会谈今天下午全部结束。据悉，双方在昨天和今天进行的共8个小时的三轮会谈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讨论。在有关双边关系的讨论中，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技术转让问题、经济贸易包括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的问题，以及文化和人员交流问题。吴学谦就有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和问题，特别是如何严格履行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原则，充分阐述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和观点。

双方还就中东、南部非洲、马尔维纳斯群岛、中苏关系、美苏关系、柬埔寨和阿富汗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会谈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国家科委主任方毅今天下午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双方就中美两国科技合作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今天上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夫人海伦娜·舒尔茨。

康克清向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表示热烈欢迎。宾主对共同关心的妇女和儿童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甘英等也参加了会见。

全明洙谴责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谴责美国南朝鲜于2月1日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活动的升级，是对朝鲜人民的赤裸裸的挑衅行为。

今天上午，全明洙大使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朝鲜人民军全副武装和人民警察队等进入准战时状态，在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明洙说，美国南朝鲜傀儡从1976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协作训练”军事演习。但是这次的活动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他说，这样，就使朝鲜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特别是这次军事演习就在军事分界线一带举行。

全明洙说，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警察队等进入准战时状态，是对付美国帝国主义挑衅活动的自卫措施。他说，“我国人民热爱和平，不愿战争，但决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我国。”

全明洙大使对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其它各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斗争的积极支持和声援表示谢意。

长途旅行参观成风，领导应接不暇

北京经营责任制试点单位叫苦不迭

室、党支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宾客满座。为此，商场除设有3名专职接待人员外，几位领导更是应接不暇。由于试点工作刚刚开始，“经验和体会”无从谈起，一些参观者要么走马观花看一通，要么抄一份业务承包合同了事。这样的参观学习会有什么收益？试点企业有关领导整天忙于送往迎来，哪有精力考虑如何完善经营管理责任制，也势必影响企业业务正常开展。此外，外埠人来京参观，不但增加了费用开支，同时给首都的交通和

食宿带来不应有的压力。

目前，商业实行经营管理责任制的方针已定，不少地区根据有关精神，结合本地区的实际，群策群力，扎扎实实开展工作，已经创造出有价值的经验。至于如何学习和借鉴外地的经验，除学习报刊有关文章之外，建议有关领导及时总结自己的经验，把有关执行细则汇编成册，通过这种途径可以以把经验学到手。因此，那种长途旅行参观学习的办法应当制止。

本报记者 赵兴林



《工人日报》△薄一波文章：学习我国工人运动先驱者的献身精神

《经济日报》△社论：成熟的改革经验要加快推广 △上海决定所有零售商业和服务业全部承包

《光明日报》△嘉定县集中科技人员成立技术服务公司，两年解决300多项难题，今年制定经济指标，超额完成15%个人

《中国日报》（英文）△新的商业政策规定，允许农民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在全国范围内贩运与出售棉花以外的一切农副产品

《经济参考》△《安徽科技报》工作人员姚亦南、王培自办《科技资料》报，目前正积极物色主人，打算3月份出版

《北京日报》△北京各区县主要领导走访科技人员，解决他们看病、看戏等困难

《辽宁日报》△沈阳曲艺团说唱队体制改革三落三起的经历说明，小改小进步，大改大进步，不改没出路

《四川日报》△威远县越溪区民办教师实行联教计酬责任制

《陕西日报》△大荔县张榜招聘能工巧匠，9个月建成一个水面580亩的渔业基地

《湖北日报》△京山县在完善责任制过程中控制提留比例，杜绝乱摊乱派，减少非生产人员，全县减轻农民负担607万元

《南方日报》△东莞县麻涌供销社与从事贩运的农民联营，去年4个月上海、武汉、宁波等地运香蕉5万多担，盈利7万元

全明洙谴责美国南朝鲜联合军事演习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今天谴责美国南朝鲜于2月1日开始的联合军事演习是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战争活动的升级，是对朝鲜人民的赤裸裸的挑衅行为。

今天上午，全明洙大使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宣布朝鲜人民军全副武装和人民警察队等进入准战时状态，在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明洙说，美国南朝鲜傀儡从1976年开始每年都举行“协作训练”军事演习。但是这次的活动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他说，这样，就使朝鲜和亚洲的和平与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特别是这次军事演习就在军事分界线一带举行。

全明洙说，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警察队等进入准战时状态，是对付美国帝国主义挑衅活动的自卫措施。他说，“我国人民热爱和平，不愿战争，但决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我国。”

全明洙大使对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其它各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斗争的积极支持和声援表示谢意。

“二七”烈士林祥谦陵园整修一新

据新华社福州2月3日电（记者蔡清河、林群英）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在“二七”大罢工中英勇就义的林祥谦烈士的陵园，最近已整修一新。经过整修的“祥谦陵园”，显得更加整洁清新，陵园陈列馆里丰富的资料，详细地介绍了“二七”大罢工的斗争史实和林祥谦烈士的生平事迹。陈列馆的墙上，挂着朱德、邓子恢、郭沫若的题词和革命老前辈何香凝题写的题词。当地的中小学，都很重视用这些资料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邮电部发行“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纪念邮票



肖秉钧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电 原水利部规划设计管理局顾问肖秉钧同志追悼会于1月24日上午在八宝山人革命公墓举行。肖秉钧同志于1月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

追悼会由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钱正英主持，副部长

李伯宁致悼词。

肖秉钧同志是河北省定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回民支队前身）政治主任、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水利部灌溉总局副局长、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规划设计管理局顾问等职。

悼词说，肖秉钧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好党员。我们要学习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不畏艰难、兢兢业业，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本世纪末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有力地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热情。三个月来，全国各有关部门都在研究讨论如何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酝酿了许多很好的设想。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又阐述了一系列重要主张。这两个报告有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在于探讨并实施能够有效地提高经济效益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经济效益的科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实践都会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结果就是这一社会实践的“效果”。社会实践的效果可以是多方面的，经济效益，即经济方面的效果，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政治效果、教育效果等等。有益的效果就是效益。无益的效果就是零效益或负效益。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方面有益的效果。

有益无益、益大益小的标准，是由社会实践的目的决定的。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经济效益就有与无大小，就是由它能满足这种需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定的。物质产品的数量，包括这些产品是否“适销对路”与质量好坏，是最为基本的。因为社会需要要用物质产品来满足。物质生产部门的状况，是决定我们取得的经济效益大小的主要因素。除了物质产品外，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还有各种劳务。这一方面也是不应忽视的。同时为了使社会需要得到满足，仅把物质产品生产出来还是不够的，还要通过流通渠道使消费者与他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结合起来。因此，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的，不只是物质产品生产部门，服务部门、流通部门等也都有重要的作用。

提高经济效益，就是提高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对于属于生产部门、服务部门、流通部门的个别单位来说，提供更多更好的劳务，做好物资分配和交换的工作，等等。全社会获得的经济效益，当然等于所有这些个别单位所获得的经济效益的总和。但是这个总和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各个单位工作的好坏，而且也会因整个社会的经济工作组织得好或不好而有所不同。人们常常用“钱”的收益来衡量经济效益的大小。但是钱毕竟只是本质的东西，当钱不能完美地反映物的情况的时候，就要从社会的观点来进行校正。这一点一定要说清楚。如果忘了这一点，只看到钱，不去看物，就会在经济工作中犯错误。

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谈论经济效益时人们的着眼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从财政部门的角度就比较多地着眼于上交国家的税利，而企业则则比较多地着眼于企业创造的全部纯收入。后者比前者范围要大部分，不仅包括上交国家的部分，还包括留在企业中的一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还应该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效益也包括在内，因而国民收入这个指标是更为适当的。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把科学同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并列，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到全党全民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应该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科学不仅指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科学不明确这一点，就会走偏方向，战略重点就会抓不好，战略目标也将难以实现。

自然科学和各种技术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它直接间接来自生产实践，并为生产发展服务。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当然应该高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但对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些同志至今还认识不清。这是值得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人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过多次失误，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为什么会一再产生失误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指导思想上看，同我们在社会科学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联系。比如由于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缺乏深刻的理解，不少人认识在国营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我国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并存的必要性，因此，盲目追求“一大二公”，追求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限制集体经济的发展，取缔个体经济的存在。时至今日，有些人对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还有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也同这一点有关。又如由于对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比例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综合平衡，不注意量力而行，在处理轻重缓急的关系、农业内部的关系、工业内部的关系、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等等问题上，也一再犯“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值得注意的是，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

于光远

对经济效益要有科学的全面的理解。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一指导思想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针对我国当前的现状提出来的。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不外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增加投入的劳动量两个方面，其中提高劳动有效性是主要的。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定要依靠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依靠政策的正确，依靠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

至于社会总产品或工农业总产值，其中包括重复计算与未扣除物质消耗，它们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效益。所以十二大报告中在把工农业年生产总值作为战略目标的同时，特别指出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这个前提。

关键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这个指导思想是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和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工作的现状提出来的。回顾历史，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提出要讲求经济效益，是在1959年春夏之交。那时因1958年搞“大跃进”，搞大炼钢铁，不讲经济效益，造成很大的损失，使经济学家感到需要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可是在当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反而提出“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错误主张。1962年和1963年重提经济效益问题，在经济学界有过一番争论。在聂荣臻同志领导下制定的我国1962年到1971年十年科技发展规划中，也把“技术经济的研究”与“基础科学的研究”、“资源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医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技术科学的研究”并列作为这个规划的七大部份之一。为因陋就简地这里所说的“技术经济的研究”就是研究经济效益的。可是在后来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居然把讲求经济效益斥之为经济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了批判。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强调经济效益，但是不重视经济效益的思想不是一下子可以纠正的。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一部分干部的头脑中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还有一部分干部认识不清或有不深。对与讲求经济效益有关的经济学规律和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办法，也缺乏知识。加上不少单位经营管理还不完善，**强调讲求经济效益在我国至今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看到，重视经济效益是一件需要人们普遍做到的事情，而这是很不容易的。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又一次强调地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个口号后，到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已有一年时间，这个“转”仍旧没有完成，因而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仍有必要再一次强调“转”这个任务。

由于实现这个“转”字并不容易，赵紫阳同志的报告要求大家牢记过去的教训，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报告对“转”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态度很坚决，措施也很严厉。不这样，是不能迅速实现这个转变的。在五届人大这次会议后，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一件事，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的工作，也需要经济学界继续做出努力。

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不外提高劳动有效性和增加投入的劳动量两个方面。

我们所说的劳动有效性，是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消耗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的比率。在取得同样大的经济效益的过程中消耗的劳动越少，劳动有效性就越大。反过来，劳动有效性越大，消耗同样多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就越大。就整个

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在建设这两个文明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出现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求我们去研究和解决。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势必涉及我国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为了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不能从已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科学上的各个领域进行创造性的探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本身需要社会科学有一个相应的大发展。对这一点，我们也有足够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少工作，党领导和组织干部群众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但总的看来，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阻碍和挫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科学水平是不高的。这种状况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很不适应的。所以，围绕着一个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认真抓好社会科学的普及和提高，对社会科学上的各个领域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正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把它提到战略重点的高度是完全必要的。

社会来说，如果劳动消耗总量为既定时，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高低就取决于劳动有效性的提高。一个单位劳动有效性提高了，不是在本单位内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就是把减少下来的劳动转移到别的单位取得新增加的经济效益。

在提高劳动有效性来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方面，不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或者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赵紫阳同志的报告中指出的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调整和整顿现有企业，提高企业的企业管理水平，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提高的作用，等等，都是提高劳动有效性的有力措施。提高经济效益对于各项经济工作来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做每一件经济工作时都要考虑这个提高劳动有效性的问题，都要在这方面计算一下，都要在这方面用一番心思。在讲求提高劳动有效性方面我们正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要求广大经济工作干部乃至广大劳动者都要注意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强调每一件事情都要想想能否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强调“千方百计”四个字。举个例子说，大家常吃黄豆，但是不注意煮熟的黄豆适宜做豆腐，有的黄豆适宜生豆芽，用适宜煮熟的黄豆适宜生豆芽，就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我有意举一个不很重要的例子，为的是强调一下经济效益“无所不在”和“千方百计”。从单项工作得到的经济效益，也许并不大，但是千千万万的不大的经济效益加在一起，就是非常之大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要靠这一点。

由于要求普遍重视提高经济效益和学会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就要求在广大干部和广大劳动者中间普及及有关讲求劳动有效性、提高经济效益的知识，**学会在各种经济工作中计算劳动有效性的简单的方法，熟悉有关劳动有效性的各种经济指标，了解提高劳动有效性的各种可能的途径，根据不同的方案会产生不同的劳动有效性，懂得应该去寻求、选择最佳方案的道理。对于有关劳动有效性的理论和比较复杂的问题的计算方法，科学工作者仍继续进行研究。近几年在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对劳动有效性问题发生了比较大的兴趣。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应该加以更大的支持。

在增加社会投入的劳动量方面，有两方面的情况应该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一、大家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失业是一个客观规律，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对这种现象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已作出科学的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不存在劳动者失业的必然性，然而在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存在劳动者不能普遍就业这种现象的。造成这种现象可以有许多具体原因。经济发育不足、投资缺乏和经济建设组织工作中的缺陷是比较普遍的原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能普遍就业的现象，经过努力是可以消除的。当社会上未能就业的人数减少时，社会投入经济建设的劳动就会增多，在劳动的有效性没有下降的前提下，社会取得的经济效益也会提高。在如何解决劳动者的充分就业问题上，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我国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个单位本来不需要的劳动力却被吸收到这个单位中去。因此，一个单位中的劳动者在事实上就有一部分劳动

时间是被闲置着。换句话说，在一个单位中真正投入经济活动中去的劳动量，比这个单位中劳动者在他们的“劳动时间”中可以提供的劳动量小得多。如果这种现象有所克服，社会经济效益就会提高。

对于如何增加社会投入经济效益的劳动量，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由于我国土地资源非常丰富，在其他经济资源方面也有不少潜在力量，只要我们找到适当的办法去利用这些资源，做好必要的组织工作，我们是可以把我国尚未投入经济建设中去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的。应该看到，在社会生产中最主要的因素，人力资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努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提高经济效益的上述两个途径中，提高劳动有效性是主要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为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而增加投入经济建设的劳动量，并不是要减少劳动者的闲暇时间。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从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来看，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应该是逐渐增加的。但是一个劳动者等待就业的时间和他在工作岗位误工或者磨洋工所耗费的时间，并不是他的闲暇时间。减少这种被浪费掉的时间，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只会为增加劳动者真正的闲暇时间创造条件。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有许许多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依靠科学，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十分重要的，也可以说是首要的，是必须靠政策的正确。**从农业方面来看，三中全会以来，1979、1980和1981这三年中，每年农业总产值率都增加2.7%，而从1952到1978这二十六年中，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共也只有2.7%。这就是说，三中全会后的三年，每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等于以前的二十六年！在这里，党的政策，特别是实行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事实来看，如果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是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在政治上的又一次大突破，那么，在农村中实行大包干联产责任制，就是贯彻这个原则在经济上的一次大突破。三年中这种责任制从少数地区扩展到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受到广大农民热烈的欢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近年来已从农村扩展到城镇，从农业扩展到工业和其他领域。在国营及集体工商企业中实行“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职工都要联系生产成果的确的责任制”，对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也很大。许多事实都证明，正确的政策对于提高经济效益何等重要！

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并且提出当前要“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大家都认为，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所做的许多必须进行的工作常常受到现行经济体制中不合理的东西的阻碍，认为不进行这种改革我们的工作的确很难前进，希望改的步骤加快。由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已经想了许多年，也做过不少试验，积累了不少经验，看清了许多问题，加快改革的进程的确有必要也有可能。赵紫阳同志报告中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应该积极进行”。这一句话我认为很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从理论上把问题研究清楚，需要进行周密的设计，需要拟定切合实际的步骤，不能急于求成。进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稳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目前情况下已经是必需和可能的改革，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采取积极的态度，没有理由由采取等若熊的消极观望的态度，没有理由让一些本已经可以革除的经济体制上的缺陷和弊病继续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胡耀邦同志最近指出，我们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总方针。

把发展我国经济的关键——提高经济效益紧紧抓住，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高潮尽可能快地到来。

重评刘邦、项羽的成败原因及其是非功过

赵文润

羽霸的分封，实际上是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与战国的分裂不可同日而语。

再次，必须历史地考察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分封制、郡县制的实行，有一个历史过程；人们对二者优劣的认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刘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实行分封制，而在于如何利用分封王侯以诱使将攻伐力。对此，项羽不如刘邦高明。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刘邦战胜项羽不是“统一战胜分裂”；实行分封制不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不能成为评价刘项是非功过的主要依据。

刘邦胜利、项羽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这个问题，《史记》有翔实、清楚的记载。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

第一，刘邦多谋善断；项羽自恃勇武，不讲策略。

有一评论说，当时刘邦已五十岁，是位思虑成熟的政治家；而项羽年仅二十六岁，是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缺乏政治经验。这话是有道理的。

第二，刘邦善于用人；项羽用人唯亲。刘邦用人不论出身高下，主量才录用。刘邦能够张良、萧何、韩信、陈平等，言听计从。

项羽骄傲自大，不懂得用人。陈平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韩信、陈平等离开他投奔刘邦。而他所信任的叔父项伯，实际上是刘邦在楚营中的奸细。

要正确评价刘邦、项羽的是非功过，首

先必须忠于史实，依据《史记》所提供的史料，不能囿于刘项斗成是“统一与分裂”斗争的成见。

刘邦在秦末农民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利用项羽起义军已经摧毁秦军主力的有利时机，乘虚而入，抢先占了咸阳，对于推翻秦暴政有一定的贡献，但并不曾同秦军主力决战，因此较之项羽的武功是为大为逊色。

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是指挥起义军摧毁秦军主力的胜利者。他在推翻秦王朝暴政的农民战争中，功勋章卓著。

项羽在同刘邦的角逐中失败了。虽然他至死不明白失败的原因，认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因而受到司马迁的责备：“岂不谬哉！”然而，司马迁还是充分肯定项羽的功绩的，说项羽“起骠骑于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有也”。项羽在战场上英勇异常，“目眦尽”，故将“目不敢视，手不敢发”；而平时却“见人恭敬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始终是一位阳刚义豪爽的英雄，直到他最后深感愧见家父老，不肯过江东。他虽然失败了，但他的见义勇为、敢作敢当、来去磊落的品格，却使人永怀难忘。从这个意义上说，项羽又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失败者。他的悲剧就在于，因屡战屡胜而骄傲，“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后脱离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才落得败死乌江的下场。这正是项羽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教训。

(摘自《人文杂志》1982年第6期)



